

中国文库

· 史学类 ·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顾颉刚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中国文库
史学类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顾颉刚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顾颉刚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9
(中国文库)

ISBN 978-7-101-05694-5

I. 中… II. 顾… III. 中国—上古史—研究 IV. K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5109 号

责任编辑：陈志刚

整体设计：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董文权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Zhongguo Shanggushi Yanjiu Jiangyi

顾颉刚 著

中华书局出版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100073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46 千字 印数：1—4500

ISBN 978-7-101-05694-5

定价：24.00 元



作者像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果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伯根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之江 王 琦 王瑞书 边彦军 吕建华 刘玉山 刘国辉
刘健屏 李 岩 李保平 李 峰 杨 才 杨 耕 杨德炎
吴江江 吴希曾 吴尚之 吴 斌 何林夏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张伟民 张 琦 陈 鹏 胡守文 俞晓群 祝君波
贺圣遂 贺耀敏 栾世禄 黄书元 曹 铁 龚 莉 惠西平
程大利 焦国瑛 解 伟 薛炎文

“中国文库”第三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刘伯根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

徐 俊 潘凯雄

出版编务组：

李红强 仵永成 蔡增裕 谢仲礼 乔先彪

全冠军

前 言

一九二九年九月，顾颉刚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学系教授，开“中国上古史研究”课。这个课程讲了两个学期，从这年十月讲起，到第二年六月讲毕。《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就是这一时期所编的讲稿。这部《讲义》的编写经过，他在《自序》中讲了的，这里就不再重复，而仅补充一些他处与《讲义》有关的记载，让读者对此书有更多的了解。

顾颉刚先生认为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中所载的古史都是传说，其中“糅杂了许多非历史的成分”，但二千多年来却一直公认这些传说为古代史实。因此他立志要把它一个一个推翻，恢复它的传说原貌。一九二三年，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时，就想把传说中的古史，一部书一部书地弄清楚，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说：“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地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个月做一篇文，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可见一部书一部书地考辨古史传说，是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时就有的想法，但在以后

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能实现。到燕京之后借着讲课的机会才把它做出来。因此这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实际上就是一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但他并不是只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一部书一部书地把其中的古史传说孤立地考证它产生的时代，而是进一步用历史进化论的方法探索这些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承前启后的演变过程，以证明二千多年来公认的古代史实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史传说演变而成的，所以他说：“我编辑这份讲义的宗旨，期于一反前人的成法，不说哪一个是，哪一个非，而只就它们的发生时代的先后寻出它们的承前启后的痕迹来，又就它们的发生时代背景求出它们的异军突起的原因来。我不想取什么，丢什么，我只想看一看这一方面的史说在这二三千年之中曾起过什么样的变动。《老子》云‘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又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这便是我使用的方法。我想，待到它们的来源和变动都给我们知道了之后，于是它们在史实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推翻，而在传说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建设了。这是我的研究这学问的大目的，而这编讲义乃是个造房屋的草图。”（《自序》一）既然这些公认的古史事实都是传说，就不存在“哪一个是，哪一个非”的问题，也不存在“取什么，丢什么”的问题；而只有实事求是地寻出“它们的来源和变动”，而每一个传说的来源和演变一弄清楚，也就自然地推翻了它的史实假象，而显露出传说的真相。因此，这部《讲义》是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提出之后，“收集本证旁证，一一加以说明”，以坚读者“诸君之信”的奠基之作。

一九三〇年八月，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说道：“现在我很想在《古史辨》之外更作两部书，一是《古史材料集》，一是《古史考》。《材料集》是把所有的材料搜集来，分类分时编辑，见

出各类和各时代中包孕的问题；《古史考》则提出若干较大的问题，作为系统的研究。这是足以使得古史的材料及辩论都系统化的；不过这两部书的完工很不容易，恐怕要迁延到我的垂老之年吧！”在这里，他说了要作《古史考》，对若干较大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而没有具体说出哪些问题，也没有跟编写这部《讲义》联系起来。但到一九三三年，顾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谈到《古史考》时则具体说了要编写《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个考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则是在编写《讲义》时想出来的。顾先生这部《讲义》，最初拟分作三编：甲编——旧系统的古史；乙编——新旧史料的评论；丙编——新系统的古史。后来看到陆懋德的《中国上古史讲义》，类于他拟编的丙编，于是拟专讲旧系统，去掉丙编，以乙编中评论旧史料的话合于甲编，另以三代制度史作为乙编，分为二编：甲编——三皇、五帝的来源，简名为《帝系考》；乙编——三代制度的来源，简名为《王制考》。可是，在编写这部《讲义》的过程中，他对古史传说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对考辨旧系统的古史想法也更为全面而严密，于是又增加了《道统》、《经学》两考，并把这四考合称为《古史考》。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说道：“可是不幸得很，编了一年，甲编尚未编完，更说不到乙、丙两编。所以然者何？只因旧系统方面，我想编四个考：一、辨古代帝王系统及年历、事迹，称之为《帝系考》。二、辨三代的文物制度的由来与其异同，称之为《王制考》。三、辨帝王的心传及圣贤的学派；称之为《道统考》。四、辨经书的构成及经学的演变，称之为《经学考》。这四种，我深信为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我们所要破坏的伪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寿命。我很想作成之后合为《古史考》，与载零碎文字的《古史辨》相辅而行。可是一件事情，计划容易，实做甚难。《帝系》、《道统》两考比较还简单；而《王制》和《经学》的内涵则复杂

万状，非隐居十载简直无从下手。因此，在燕大所编的《上古史讲义》只成了《帝系考》的一部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卷一期）即是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此后为了预备作《王制考》，改开了《尚书研究》一课，一篇篇地教读，借它作中心而去吸收别方面的材料。”这个庞大的《古史考》系列，也就是顾颉刚先生心目中全面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因此这部《讲义》又只成了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古史考》虽然未能作成，但他提出的《帝系》、《王制》、《道统》和《经学》四考，确是抓住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中心，是他深邃、宏伟的构思，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后人继起考辨古史传说有参考意义。他自己也说：“将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一定有本国的同志起而继续之的，我很愿他参考我的计划。”

任何重要事物的研究，从开始提出疑问、设想，到最后解决，往往要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考辨古史传说的问题同样如此。所以顾颉刚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又说：“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这句话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凡是会过去的只有一时的风气；……所以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会有人继续写的，只有问题到了合乎事实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像《伪古文尚书》一案，才没有人会浪费精神去写，这是我敢作预言的。”无论作任何研究，考辨材料的真伪、时代及其性质，总是基础工作。因此古史传说的考辨工作如顾先生所说的还要长期做下去。

此书最后三章，曾在刊物上单独发表过：第三十二章《孔子家语五帝篇》，曾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

的扫除工作》的篇名刊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北京大学潜社的《史学论丛》第二册；加了一个“前记”，并改写了第一段。第三十三章《后期的三统说》，曾用《三统说的演变》的篇名刊于一九三六年三月的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后面有童书业的一篇跋，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编；第三十四章《潜夫论》，曾用《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的篇名刊于北平研究院的《史学集刊》第三期，童书业也加了一篇跋，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编。

这部《讲义》，燕京大学曾油印发给听“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的学生，由于印数少，很少流传。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几次大劫难，留存下来的更少。《第二学期讲义序目》油印本未刻印，后来发表在《古史辨》第五册，这次据以补入，并核对了顾先生的手稿，但为了便于翻检，没有按原来的顺序置于第二十六章之前，而是移置于书首，并将“序”和“目”分开，第一学期讲义序，改为“自序一”，第二学期讲义序改为“自序二”，两个学期讲义的目合在一起，接着通排。书中每章原来都仅有数字顺序而没有章名，这次整理时都据目录增加了章名。

顾先生的这部《讲义》的手稿保存了下来，整理时据手稿改正了油印本刻印的差错。后来顾先生在油印本上又作了一些增订，也照着改正。引文的差错，则核对原书改正。

王煦华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自序一

本学期的讲义编到这里，已快放寒假了，只得作一个小结束。趁这个机会，请让我把编讲义时的意见与计划陈述一下。

中国的古史，为了糅杂了许多非历史的成分，弄成了一笔糊涂账。汉以下的学者从事整理的虽很多，但这些材料太乱了，没法摸出一个头绪来，不得不各自用了主观去定取舍，分前后。但这样地定了，分了，在各个人的本书里看去似乎已很整齐，很清楚，而在古史的全体中则反而加增了一层混乱，使得于原来的糊涂账之外更添出一笔新的假报销来。因为这个缘故，二千年来说到古史总是没办法。倘使我们再用了他们的方法做下去，所得的结果不过在已失败的古人之后更照样地失败一次而已。

只有司马迁和崔述，他们考信于《六艺》，凡《六艺》所没有的，他们都付之不闻不问。这确是一个简便的对付方法。但《六艺》以外的东西并不曾因他们的不闻不问而失其存在，既经有了这些东西，难道研究历史的人可以闭了眼睛不看吗？况且就是《六艺》里的材料也何尝都是信史，它哪里可以做一个审查史料的精密的标准呢？所以他们的不信百家之言而信《六艺》，乃是打破了大范围的偶像而崇拜小范围的偶像，打破了小势力的偶像而崇拜大势力的偶像，只挣得“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资格罢了。

我们现在受了时势的诱导，知道我们既可用了考古学的成绩作信史的建设，又可用了民俗学的方法作神话和传说的建设，这愈

弄愈糊涂的一笔账，自今伊始，有渐渐整理清楚之望了。但是这件事业太大，牵涉到的问题太多，决不是几个人在短时间内所可穷其究竟的。

前数年，我曾研究了这方面的几个问题，又把若干篇讨论文字合成一册《古史辨》。因此，社会上以为我是专研究古史的，就有几个学校邀我去任中国上古史的课；我只有逊谢。这因担任学校的功课必须具有系统的知识，而我仅作了些零碎的研究：试问图样未打，模型未制，如何可以造起渠渠的夏屋来呢！若说不妨遵用从前人的系统，那是违背了我的素志，又是不愿意干的。

民国十六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到的时候已开课了，功课表上已排上我的“中国上古史”了，而且选课的人也选定了。这一急真把我急得非同小可：这事当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得不编讲义而专印材料，把许多人的零碎文字钞点出来，约略组成了一个系统。那时所印的材料分作五种：

甲种——上古史的旧系统，以《史记》秦以前的本纪、世家为代表；

乙种——《史记》本纪、世家所根据的材料及其他真实的古史材料（其实这两类不应合在一起）；

丙种——虚伪的古史材料，古代的神话传说与宗教活动的记载；

丁种——古史材料的评论；

戊种——豫备建立上古史新系统的研究文字。

这样地教了一年，搜集到的材料不能算少，但自问把这些材料系统化的能力还差得远；而且范围太大，一个人也不能同时注意到许多方面。所以第二学年开始的时候，就改讲了别种功课。

本年到燕京大学来，也同中山大学一样“中国上古史研究”的

课目早公布了。幸而我有了以前一年的豫备，不致像那时般发慌。但前年编的是些零碎材料，没有贯穿的，又以粤校印制方便，故可充分点印，现在则不该如此，亦不能如此了。计划的结果，拟就旧稿改为较有系统的叙述。后来想，前年分作五种，只以先读《史记》致然；现在则分作三编就够了。这三编是：

甲编——旧系统的古史；

乙编——新旧史料的评论；

丙编——新系统的古史。

因为有此计划，故讲义的首页便写作“甲编”；并拟在甲编中分作夏前和夏后两部分，故以夏前部分写作“甲编之上”。那时计算时间，每一编只占到两个月多，这“甲编之上”只可讲一月馀，所以我竭力地把篇幅节缩，起首数章写得很简单。

不久，看见本校陆懋德先生所编的《中国上古史讲义》，他是专从信史一方面讲的，类于我拟编的丙编。我想，那很好了，我在新系统的古史方面既无切实的把握，又幸有陆先生在前，我乐得藏拙了。于是拟专讲旧系统，去掉丙编，又以乙编中评论旧史料的话合于甲编，另以三代制度史作为乙编，而为：

甲编——三皇五帝的来源，简名为《帝系考》；

乙编——三代制度的来源，简名为《王制考》。

这因旧系统里，虚伪的史事丛集于帝系和王制两类之中：三皇五帝，人和事都不真；三代文物，则人虽真而事多假。如能把这两种问题作成较有系统的说明，对于审查旧史料之道亦可谓思过半矣。我于是想把“甲编之下”也搁着了（这方面的伪史不多，和三皇、五帝材料的质量相差太远，不讲也不算缺典）；既无“之下”，自然这“之上”二字就可涂掉了。

可是过了些日子，事实又逼迫我变更计划了。三皇五帝一问

题的讲义，开头固甚简单，但后来忍不住了，渐渐地放手了；开头每章只写几百字的，到近来每章都成一万字了。这样的下去，到这一学年之末不过把甲编讲完而已（如纬书、道书、刘歆、王肃、《河图》、《洛书》、《皇极经世》、《外纪》、《前编》、《路史》、《绎史》等等都是很大的题目，如不赶紧，恐怕到这一学年之末还讲不完呢），哪有余力再写乙编。若说节省字数，又觉得这个问题牵涉太多，如不收集本证旁证，一一加以说明，怕要看不明白，即使看得明白也无以能坚诸君之信。而且我们这一课定名为“研究”，大可借着讨论史料的真伪问题使得它研究化，正不必但以灌输常识了事。所以现在的决定，连这“甲编”两字也删去了。

至于原意放在乙编中讨论的问题，如分州，封国，建官，制爵，改正朔，易服色，封禅，巡狩，赋税，丧服……等等，拟于下学期每星期三的一小时里在黑版上写些出来。

我编辑这份讲义的宗旨，期于一反前人的成法，不说哪一个是，哪一个非，而只就它们的发生时代的先后寻出它们的承前启后的痕迹来，又就它们的发生时代的背景求出它们的异军突起的原因来。我不想取什么，丢什么，我只想看一看这一方面的史说在这二三千年之中曾起过什么样的变动。《老子》云：“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又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这便是我使用的方法。我想，待到它们的来源和变动都给我们知道了之后，于是它们在史实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推翻，而在传说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建设了。这是我的研究这门学问的大目的，而这编讲义乃是个造房屋的草图。

七年前，我和刘掞藜、胡堇人两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时候，曾说：

我想把胸中所有的意见详细写出，算做答文，与两位先生讨论下列诸项问题：（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与夏有没有